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4.011

恩格斯视野中的“第三要素”及其当代价值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学视角看

冯凯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第三要素”是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判古典经济学理论时发现的被古典经济学家所遮蔽的内容。作为精神要素的“第三要素”是恩格斯对以往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恩格斯的研究启发了青年马克思由法学、哲学研究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转向。精神生产理论的分野标志着恩格斯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不同,为唯物史观的出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精神要素在社会进步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启示我们必须重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从恩格斯基于时代发展和国情特点展开的论析中汲取智慧。

关键词: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要素”;生产费用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4-0077-07

1880年,马克思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撰写法文版前言时强调,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注意,他认为,“《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491}。此时马克思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研究领域更为宽展,但对恩格斯的这部30多年前著作依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充分说明了《大纲》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大纲》还被马克思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592},对他创作《资本论》及其手稿及其政治经济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大纲》“是《资本论》的起源和‘底本’”^[3]。因此,以精神要素为突破点开展对《大纲》的文本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厘清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脉络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相较于《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尚显不足,亟待开展文本学意义上的研究和阐

释。《大纲》共15个小节,对“生产费用”的研究阐释力度相较于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科学技术思想、道德思想来说力度不够,相当一段时期没有把对精神要素的研究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在《大纲》中,“第三要素”即精神要素,具体而言,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4]67},是与肉体要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因素,包括发明创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对理解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单独将恩格斯关于精神要素的生产作为一个独立思想单元进行深入研究,阐述其理论逻辑和深刻内涵,以从中汲取丰厚滋养和精神力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源泉。

一、“第三要素”: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内容

《大纲》第5小节,恩格斯着重批判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深刻阐述了“第三要素”在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与

收稿日期:2023-03-01

基金项目:2021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浸润与突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活向度研究”(SK2021A0207);2020年度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教师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文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QNSK202003)

作者简介:冯凯(1994—),男,山东济宁人,法学硕士,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理工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资本主义生产的密切联系。恩格斯认为,经济学家将“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作为商品生产费用的三个组成要素,表达了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理解。不过,恩格斯发现资本即劳动,因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4]70}。因此,生产费用仅剩“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4]67}即劳动。在“劳动”这一要素之下,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视野,他认为,劳动囊括资本和“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4]67}即精神要素。这是“第三要素”的由来,表征了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独到理解,这既是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超越,也是恩格斯在实践观察的理论成果。这一点凸显了精神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具体来看,在《大纲》的15个小节中,“生产费用”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环,成为透视政治经济学及恩格斯与以往古典经济学家的区别的重要视角。

正是由于对生产费用的理解不同,导致了恩格斯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理论上的分野。在《大纲》第4小节“价值”中,恩格斯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4]67},阐述了自己对价值的理解,建构起了生产费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价值”这一小节在结构上是向“生产费用”过渡的一节,对于理解“生产费用”具有基础性、铺垫性作用。恩格斯把价值区分为抽象价值(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这是澄清理论上混乱局面的前提条件。麦克库洛赫认为,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萨伊强调,生产费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没有人会卖得低于他在生产中的投入。恩格斯批判了他们的庸俗经济学^①的观点,剖析了他们离开竞争谈论价值问题造成的理解上的错误之处。与之不同的是,恩格斯认为,理解生产费用必须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竞争可以决定生产费用,进而批判了“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恩格斯的观点称之为以竞争关系为基础的价值理论。

可以看出,恩格斯发掘出了古典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的因素,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这是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发现,构成了他的理论生长点,推动了

他进一步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的相关内容。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时的恩格斯仍然处于思想上的探索时期,模糊了工场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之间的界限,未能进入到机器大工业的思考视域中,没有“站在社会化交换关系的理论层面”^[5]上思考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还没有超出经验观察的范围理解价值理论,这是他理论思考中的不足之处。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此时研读的是约翰·雷姆塞·麦克库洛赫编辑出版的1828年版《国富论》^②[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作者生平、序文、注释和补充论述》(四卷集),1828年爱丁堡版]。麦氏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自居,试图对李嘉图经济学说进行简单化阐释,指出“不仅积累劳动产生价值,动物和自然力也都创造价值,平均利润与劳动价值不是对立的”^[6],这一观点给劳动价值论的正确理解增添了困难。但是,恩格斯对精神要素的理解却是极具价值的,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予以把握。尽管恩格斯晚年认为《大纲》“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7]209},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本文认为,恩格斯的精神要素理论及生产费用二要素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着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凝结着他丰富的哲学智慧,是批判基础上的重建,是承继基础上的扬弃。此时的恩格斯年仅23岁,随着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确立,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将会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二、精神要素在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所处的位置

要想完整准确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三要素”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意义就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准确定位其在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中所处的位置,才能更好地揭示其理论价值。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的哲学家,他写作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理论困

^①有学者深入考察了“庸俗”一词的翻译问题,认为在中文语境中,这纯粹是一个贬义词,而在德语中它包括“不涉及本质的”“不科学的”“简单化的”“肤浅的”“家喻户晓的”等含义。(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5期聂锦芳《马克思的“突围”——重思他对古典经济学思想图景和演变脉络的理解》)

^②参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周嘉昕《重访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

惑,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现实问题,《大纲》的创作也不例外。因此,准确理解精神要素在恩格斯思想发展史中所处的方位,必须以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境遇和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参照,在文本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图景中追寻历史原貌、考辨思想源流、观照现实境遇,在思想的演进历程中透视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脉络。《大纲》是表征青年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作,大约在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完成,载于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原文是德文。学界普遍认同的是,它是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同时,它也昭示出青年恩格斯开始逐渐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的影响。

恩格斯最初的理论思考和写作活动植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背景中,是随着青年黑格尔派解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他在柏林服兵役时对谢林哲学的批判,还是参与“自由人”小组活动时由于对他们蔑视群众而与之分道扬镳,都昭示着此时恩格斯思想的变化轨迹。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尝试突破黑格尔哲学的界限,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剥离出来,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亲身实践弄清楚私有制、商业、道德等问题背后的根源。1841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他经常去柏林大学旁听,而且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由于不赞成这个团体的唯心主义倾向,恩格斯后与之分道扬镳。正是他在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背景为他对其日后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展开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无论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还是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都证明了这一点。几乎同一时期,他撰写了一组共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分别为《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三篇文章采用了与青年黑格尔派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历史,建立了从客观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的理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纲》透露出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致思路径,尤其是在看待社会问题的出发点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彰显着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等人正处于思想的决裂过程中。有学者经过考证指出,这一时期,恩格斯阅读了卡莱尔、傅立叶、布雷、汤普逊等

人的著作,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遭遇和命运。此后,他又着力“从自由的哲学原则出发来揭示现实尘世生活中的矛盾”^[8],这种矛盾促使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后开始深入思考商业的欺诈、竞争的不道德以及私有制的罪恶。

除理论背景以外,恩格斯的亲身实践经历和所遭遇的实际情况也是昭示他此刻思想发展走向的重要标识。准确理解精神要素在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所处的方位,就必须深入挖掘1843—1844年青年恩格斯的实践历程。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线拉长一些,作为《大纲》创作“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1838年至1841年不来梅时期和1842年至1844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经商经历,这对理解恩格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理解《大纲》中所阐发的精神要素理论的一把钥匙。不来梅时期,恩格斯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伍珀河谷来信》,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肉体 and 精神的压迫,并亲身感触到了“商业的秘密”,在实践中检验了他的理论思考。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目睹了这座“世界棉纺织业中心”的真实情形,见证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为了找寻根源,他深入研究了工业革命后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还参与宪章派的活动,广泛接触工人运动。在21个月的实践活动中,他对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状况亲自做了调查并开始思考如何进行革命来变革私有制的关系,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几个月以后,恩格斯在巴黎与马克思会面后,共同创作了《神圣家族》,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作为现实的人进而将其规定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现实人道主义的思想内涵,使他对资本主义及其矛盾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走向毁灭的发展趋势。基于这种实践走向的分析和批判,恩格斯喊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4]262}的口号。可见,正是由于恩格斯在《大纲》中抓住了私有制的根本矛盾,才使他能够洞悉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罪恶。因此,精神要素不仅在恩格斯思想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启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青年马克思由法学、哲学研究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

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524} 在这一著作中他们更进一步强调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将《大纲》中谈到的人的精神活动发展到精神生产层面,并一直持续深入地思考下去。

本文认为,精神要素作为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既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也启发和影响了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可以说起着中介和过渡作用。因此,今天我们准确把握精神要素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恩格斯与古典经济学家对精神要素的不同理解

上文提到,恩格斯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恩格斯发现并阐述了他们在理论建构上的疏漏,即忽视了精神要素在生产费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恩格斯的思考更具有前瞻性,他认为,“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4]67},这说明,精神要素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建构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古典经济学家片面强调土地、资本、劳动的作用,不懂得重视科学,忽视了精神要素的作用。恩格斯将精神要素视为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纳入生产力发展的范畴,视其为科学,为唯物史观的出场奠定了生产力基础。“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财富只能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中产生,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是有限的。”^[9] 他们只关心科学技术能否带来利润,把利润看成追求财富的助推器。恩格斯深刻认识到了精神要素作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对提高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此,他指出,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利用科学进行的发明使生产力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恩格斯进一步举例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4]67} 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十分强调精神要素的科学作用,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财富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本、劳动”的错误观点。

第二,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精神要素的作用,

没有给它在生产费用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恩格斯明确把精神要素列入生产要素范畴,并且在政治经济学中为之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了精神要素的作用,不承认它作为科学的生产力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撇开对精神要素的理解和运用,只关注利润及获得利润的方式,在认知上过于形式化。恩格斯尝试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剥离出来,强调人的精神活动在劳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指出精神要素在生产要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恩格斯对古典经济学家撇开精神要素和精神活动的经济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抽象性,人的精神活动会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进而创造出丰硕的社会财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要素。

第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三个要素组成,而恩格斯却将其改造成“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发展,这一观点成为建构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坚持生产费用“三要素”的观点,恩格斯批判了这种观点,将自然和人视为生产要素的两个组成部分,后者包括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可以看出,恩格斯密切关注《国富论》及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亲身经历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他在《大纲》中对土地、竞争等小节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不可否认,在精神生产领域中分担商品生产总体职能某一部分的劳动,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批判了亚当·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定义的二重性,强调非生产劳动“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10]218}。显然,精神要素与非生产劳动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是对《大纲》中精神活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古典经济学家不重视劳动,将劳动视为资本的结果,没有固定的尺度衡量劳动在生产中所占据的比重。恩格斯将生产要素中“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提升到很高的位置,将其视为生产要素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他洞悉了由私有制带来的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致力于扬弃私有制,破除贫困、奴役、无知的根源。《大纲》第8小节“劳动”是与精神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一节,在这一节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劳动的地位,认为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4]72}。但是,劳动却始终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它所占的比重没有被得到合理的估量和计算,背后的根源就是私有制。在恩格斯看来,是私有制导致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工资作为劳动的产物与劳动自身相对立、矛盾。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致力于破除私有制的藩篱,扬弃私有制。他强调:“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4]72} 尽管此时恩格斯思想中还有着人本主义的思想印记,“既体现出李嘉图社会主义的色彩,也折射出费尔巴哈的影响”^[11],但笔者仍然认为,这是恩格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包含着重大的理论创新,尤其是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把握住了私有制的本质,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实现了由现象到本质的跃升,为唯物史观的出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四、精神要素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价值

“生产要素包括自然即土地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12]79} 可见,精神要素的生产在社会发展进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精神活动对社会发展进步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深刻总结《大纲》中的精神要素、精神活动理论,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发展其当代价值,有助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方向指引。

首先,应高度重视文化创新创造,以创新推动发展,汇聚起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纲》是恩格斯亲身实践探索的成果,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恩格斯在《大纲》中详细论述了古典经济学的各个方面,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所没有关注到的内容,为我们看待社会的发展进步打开了新的视角。精神要素所包含的变革性力量和超越性理念构成了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它能够成为改造现实的实践力量,实现观念与现实、哲学与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有益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3]。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想顺利实现在 2035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就必须高度重视创新,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提升创新能力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创新,把提升创新能力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创新、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深刻推动理念创新、思维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以创新引领带动我国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全方位变革。

其次,应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为推动生产发展、社会革命积蓄动能。《大纲》第 15 小节专门论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科学技术是“特殊的优越条件”,批判了资本家贬低科学技术,将其视为追求利润的工具的观点。恩格斯以棉纺织业的变革为例加以详细说明,强调机器的不断革新和发明能够降低生产费用,提升劳动效率。因此,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把科技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鲜明地把科学技术摆在了突出位置。实践不断证明,生产力中蕴含着科学要素,推动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3],报告中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论述,既强调了系统的观点,将三者予以统筹考虑,又强调了联系的观点,强调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必须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应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创造伟力。恩格斯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揭露无产阶级肉体和精神贫困的根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私有制,强调“要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14]。恩格斯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痛斥了私有制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灾难,这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立足于当前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 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通过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一切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作用。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凝聚起最广泛的精神力量。

最后,应不断深化对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引导资本朝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发展。恩格斯在《大纲》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阐述了“私有制的经济学”的弊端即资本主义的不道德性。在第7小节“资本”中阐述了由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带来的罪恶以及人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对立。对此,恩格斯设想实现“超越利益的分裂”,使社会生产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一步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16]。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17]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认识,与时俱进推动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深入挖掘《大纲》中的理论资源,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稳致远。尤其要强调的是,思想交往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社会的观念结构,人们之间的文化交往及其规范化,构成了社会的文化制度,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引领和价值规范作用,抵制资本的负面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大纲》时期的恩格斯立足社会现实,结合亲身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私有制这个主要矛盾,对私有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将其建立在竞争的理论基础上。因此,《大纲》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是有了对精神要素的深入理解,恩格斯开启了对精神要素的深入研究。在《大纲》发表之后的岁月里,恩格斯对于生产费用、精神活动的研究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

深化,也在不断地回应现实问题。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对精神生产的创见:“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4]270}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已明确将精神生产纳入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生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仅专门研究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具体内容,而且在分工的意义上考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明确将精神生产视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的探索并未终止,而是一直持续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精神生产的内涵得以扩大,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理解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强调精神生产必须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8]296}。因此,关于精神要素的理论不仅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条件,而且为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启示。总之,《大纲》不愧为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献。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白刚.《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的“底本”[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3).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唐正东.基于竞争的价值理论:青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探索——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价值理论评析[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6]聂锦芳.马克思的“突围”——重思他对古典经济学思想图景和演变脉络的理解[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5).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8]唐正东.哲学与政治的结合: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

[9] 蒋红. 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贡献——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3).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周嘉昕. 重访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考察[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12] 姜海波.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1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4).

[14] 程恩富, 朱炳元.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10).

[15] 魏泳安. 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及当代价值——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及内容的分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4).

[16] 简新华. 正确认识“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N]. 光明日报, 2022-09-27(11).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 2022-05-01(01).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一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The Third Element” in Engels’ Vis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From the Textual Perspective of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ENG Ka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element” is the content that Engels finds hidden by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when he criticizes the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in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 spiritual element, “the third element” is Engel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former classical economists’ theories. Engels’ study inspires young Marx to change from law and philosophy to political economy. The divis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ory mar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els and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lay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piritual element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which tells us that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arousing the vitality of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and gather the great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this sense, we must draw wisdom from Engels’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Engels;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third element”; production cost

(责任编辑 雪 箫)